

【文化理论】

论文化研究的“去殖民性”转向

顾明栋 彭秀银

【摘要】“去殖民性”是21世纪初在文化研究领域出现的一种新理论,该理论首先由拉美的思想家和学者提出,逐渐在西方思想和理论界引起较为广泛的关注,并已发展为文化研究的“去殖民性”转向。通过对“去殖民性”理论和现状进行批判性反思,可以审视其与后殖民研究的异同,厘清跨文化研究领域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从而给终极去殖民化和后殖民研究提出中国学者的不同见解。需要反思的问题主要涉及“去殖民性”的概念、该概念产生的背景、“去殖民性”的理论现状和终极目标、其与后殖民研究的关系,以及该理论的洞见、盲点、缺憾和补救策略等等。通过反思我们提出“殖民无意识”概念,并认为殖民无意识是殖民主义软实力的内在逻辑,也是实现去殖民性目标的终极障碍。

【关键词】去殖民性;殖民主义;殖民无意识;后殖民研究;文化研究

【作者简介】顾明栋,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人文艺术学院教授(广东 深圳, 518061);彭秀银,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江苏 扬州 225002)。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21.2.159~168

“去殖民性”(decoloniality)是21世纪初以来在文化研究领域一个较为热门的理论问题,这一新概念由拉美的思想家和学者首先提出,逐渐在西方思想和理论界引起广泛关注,并已发展为文化研究的“去殖民性”转向。^①根据国外现有的研究,“去殖民性”作为拉美的思想家和学者首先倡导的一种后殖民研究理论,其目标是要将知识的生产从欧洲中心主义的认识型中解脱出来,建立以本土知性资源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其首席理论家阿尼巴·奎加诺(Anibal Quijano)是秘鲁社会学家和人文思想家,他强烈质疑西方知识的普世性,认为这是西方文化优越论和帝国主义霸权的意识形态根源,他将这一根源称之为“权力的殖民性”,^②“去殖民性”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都从其著作中汲取了理论营养。另一位理论家是美国学者沃尔特·米格诺罗(Walter D. Mignolo),他发展了奎加诺的“权力的殖民性”,提出“权力的殖民母体”(Colonial Matrix of Power, CMP),着力批判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他认为,殖民性是西方人和各种机构从文艺复兴时代起就创建并操控的一套复杂的权力母体,是西方现代性中见不得人的一面,而且一直左右

着全球的历史进程直到当下的新自由主义时代。^③也许是受福柯的“权力—知识”复合概念的启发,他在反思殖民性的历史和现状时提出了“现代性—殖民性—去殖民化”三位一体概念,指出“去殖民性”必须与西方现代性主导的权力殖民母体脱钩,以想象和构建一个不以剥削人类和自然、不以聚集财富为目标的未来。这两位理论家的思想对“去殖民性”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其他众多的社会学家、哲学家、文论家和文化研究学者的参与,有人将这一知性运动称为文化研究领域的“去殖民性”转向,也有人将该理论动向视为旨在创造一种调和文化研究领域不同理论矛盾的新辩证法——“去殖民化辩证法”。^④

由于该理论涉及后殖民研究的领域,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它是后殖民主义的发展,然而,该理论的拥护者声称,“去殖民性”研究并不是后殖民研究,甚至对有人将两者混淆表示遗憾。因此,“去殖民性”研究也产生了一些争议和质疑。本文试图探索如下问题:何为“去殖民性”?该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其理论现状和终极目标是什么?现有的观点有哪些洞见

和盲点?去殖民性如何才能实现?将文化研究领域的去殖民性研究视为“去殖民性”转向是否合理?此外,本文试图对现有的“去殖民性”研究进行批判性反思,厘清一些含糊不清甚至令人困惑的概念性问题,审视其与后殖民研究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剖析该理论的缺憾并思考补救策略,在此基础上提出“殖民无意识”的概念,以此探讨殖民主义软实力的内在逻辑,给去殖民化和后殖民研究提出中国学者的不同见解。

一、“去殖民性”转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土崩瓦解,去殖民化运动风起云涌,前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纷纷赢得民族独立和解放,世界也进入了后殖民主义时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去殖民化,众多思想家和学者认为,声势浩大、席卷全球的去殖民运动并没有完成,事实上,在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去殖民化是失败的,有些地区甚至连表面的去殖民化都没有完成。那么,去殖民化在什么方面尚待完成?这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在全球化语境下必须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去殖民化有两个主要维度:一个是领土和统治的去殖民化,另一个是精神和文化的去殖民化。毋庸置疑,去殖民化在政治和领土方面已经完成,在经济领域也取得巨大成就,但在精神和文化领域,去殖民化远远没有完成,这表现在殖民主义遗产不仅没有得到彻底地清理,而且在思想、学术和精神领域还有所加强,殖民主义在全球化时代不再以占领土地、从政治上奴役前殖民地为目标,而是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奴役第三世界人民,已经演变成了新殖民主义。

因此,在思想、精神、心理和情感上,无论是前殖民地宗主国的人民,还是第三世界人民都没有真正从殖民主义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去殖民化和去殖民性是两个息息相关的概念,简而言之,去殖民化是手段,去殖民性是结果,去殖民性的结果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政治、经济、制度等实体方面的去殖民化,一是心理、精神、文化等软体方面的去殖民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完成第二个维度的去殖民化更为艰难,因为这需要完成认识论重构、知识体系的重建和

心灵的去殖民化,这一系列努力的完成是去殖民化的终极目标。衡量这一目标是否实现的标志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去殖民化的结果在实体和软体两大方面是否消除了殖民主义的影响,即达到了“去殖民性”。这也许是“去殖民性”转向兴起的根本原因。从全球化以来世界的去殖民化现状和第三世界人民的心理、精神、文化这些方面来看,“去殖民性”转向是合理的,甚至是必然趋势。

随着“去殖民性”转向的大势所趋,从21世纪初到当下,“去殖民性”在欧美和大洋洲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已经形成了后殖民研究的一个新趋势。这一新趋势渐渐成为一个热点,最突出的表现是,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前几年决定出版一套以“论去殖民性”为主题的系列丛书,该丛书旨在审视世界各地出现的有关去殖民化的思想、观点、争论、表述、实践和发展过程,并将其与世界各大洲兴起的去殖民性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探究去殖民化运动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以及如何才能达到去殖民化的终极目标——“去殖民性”。这套丛书的开篇之作于2018年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就是《论去殖民性》(On Decoloniality)。^⑤该书的作者是前面提到的杜克大学罗曼语系文学研究讲座教授沃尔特·米格诺罗和美国拉美裔学者凯瑟琳·沃尔西(Catherine E. Walsh)。该书出版后,后殖民研究的旗舰学刊《后殖民研究》邀请了一些学者围绕该书发表了一组讨论文章。^⑥本文作者应邀参加了《后殖民研究》学刊的讨论,并发表了评论文章。通过细读该书,笔者对“去殖民性”的理论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觉得这是对后殖民研究的一种推进,但另一方面也觉得,由于“去殖民性”理论的发起者是拉美思想家和学者,他们视野的地域性给“去殖民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留下了广阔的探索空间,甚至在概念性构思方面也留下了令人困惑、有待深入探索的地方。

二、什么是“去殖民性”

去殖民性的主要观点在《论去殖民性》一书中有着清晰而又较为系统的表述。该书的主旨“是对尚不了解的读者介绍‘去殖民性’,同时对已经熟悉‘去

殖民性’的读者进一步提高认识,‘去殖民性’是在现代性/殖民性/去殖民化框架内的一种具体展示和实践”。^⑦笔者曾写过一本《汉学主义: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另一种选择》的著作,^⑧因而对殖民主义、去殖民化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比较熟悉,但我们在细读该书所阐述的去殖民性之后有时会产生一些如堕云雾之中的感觉。这本书涉及殖民化和殖民性这两个基本问题,一方面该书承认后殖民研究早期思想家弗朗兹·法农和爱德华·萨义德对此产生过影响,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其归属于后殖民研究范畴。但是,另一方面,该书对“后殖民性”的论述显然不同于现有的后殖民研究的论述,一些“后殖民性”转向的提出者甚至坚决地声称:“后殖民性”不是后殖民研究的一种新形式,进而对有人将“后殖民性”与后殖民研究混为一谈表示遗憾。我们在对比两者的异同之后认识到,两者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因而是一种既有新颖洞见、又有盲点的后殖民研究。

去殖民性的原创性在于,它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取向不太相同,它致力于批判西方现代性宏大叙事的神话,揭示现代性在殖民主义500年统治中所发挥的作用,通过提出并界定“权力的殖民母体”这一概念,揭示现代性的阴暗面和西方文明主宰世界的内在根源,并根据奎加诺对殖民性和殖民化的区分深入分析去殖民性和去殖民化之间的关系和区别,进而提出第三世界的认识论和知识体系的重构。“去殖民性”转向的中心议题自然是“去殖民性”,已有的研究从概念和实践两个角度对此进行了理论构建和实践研究。这些探讨产生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去殖民性”思想和见解。然而,正如去殖民性的提出者一再申明的那样,去殖民性的概念还没有定论,是一个开放的话题,值得从多个角度进一步讨论。事实上,我们在仔细研读了《论去殖民性》一书之后,更加强烈地认为,有必要厘清去殖民性的概念性问题以及如何达到去殖民性的实践问题。

受到奎加诺的“权力的殖民性”理论的启示,《论去殖民性》一书将殖民性与“权力的殖民母体”视为

一体:“殖民性(CMP)这个概念,揭示了16世纪以来西方文明的基本逻辑、形成进程和广泛扩张。”^⑨两位作者都详细讨论了殖民、殖民化、殖民主义和去殖民化,但他们并没有提供一个清晰易懂的“去殖民性”定义。最接近定义的描述是:“去殖民性,正如我们在这本书中所说,不是一个新的范式或批评思想的模式,而是一种方式、选择、立场、分析、计划和实践。”^⑩这一说法既有优点也有欠缺,优点在于开放性,欠缺在于模糊性、不确定性。米格诺罗以一种宽泛而模糊的方式进一步概念化,他把去殖民性看作是一种思考和生活方式:“殖民性的概念化和分析,即一种去殖民化的思考方式,也是生活、行为、感知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去殖民化突变为去殖民性。不作为即是有所为,解除连接的前提即是重新连接。由此,去殖民性是不作为,又是重新有所为,是一种实践。”^⑪

显然,这种宽泛而模糊的去殖民性构想及其概念化描述既有洞见,又有盲点。它引人入胜之处是因为让话题的范围变得开放;令人不满之处是因为它实际上等于说了一些空话。如果说去殖民性是一种思维和生活方式,那么,殖民性也是一种思维和生活方式。殖民化、去殖民化、殖民主义、殖民性和许多其他人类活动也是如此。因此,它实际上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去殖民性”。但如果批评米格诺罗纯粹是在空谈去殖民性,这也许不够公平,因为他确实把这一概念与其相关概念联系起来。在研究了“殖民主义”“殖民化”“殖民性”和“去殖民性”的现有定义之后,米格诺罗如此阐述去殖民化和去殖民性之间的本质差异:“去殖民化旨在殖民主义的废墟上建立主权民族国家,去殖民性旨在拓展、解放、超越国家设计以及企业和金融的去殖民化视野。”^⑫这一区分似乎表明,去殖民化是一场争取民族解放的政治运动,而去殖民性则是一场促进体制变革的社会运动。我们的归纳也许能有效地甄别这两个概念。去殖民化是一项已完成的任務,应该抛在一边;我们应该立足现在、展望未来,着眼于摆脱殖民主义和殖民化的思考和生活方式。但这种区分显然忽视了“去殖民性”和“去殖民化”的联系,即前者是手段,后

者是结果。而且这样的区分也与作者在其他地方的观点相矛盾,例如米格诺罗在“后记”中指出:“全球殖民性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而且还体现在知识和文化等所有领域。”^⑧诚如米格诺罗所言,殖民性是一个复杂的管理和控制结构,是一个权力的殖民母体,而去殖民性只有在脱离殖民性时才能产生,这样一来,我们如何区分政治、经济、军事的去殖民化以及认知和文化的去殖民化呢?

由于定义的宽泛和缺乏清晰的描述,去殖民性的论述产生了一些混乱和矛盾之处。因此,很有必要从概念性视角厘清去殖民性的定义。根据牛津英语词典,“殖民性”是19世纪中叶开始使用的一个词,意思是“殖民性质或特征;殖民地的现实或状态”。与其对去殖民性的宽泛定义相比,米格诺罗对“殖民性”的定义范围却比较狭窄。他说,“去殖民性”是“冷战结束时(地缘政治知识)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前殖民地产生的一个概念”,显然,这一论点在历史和词源上都是不够准确的,在意义和范围上也过于狭隘。作者的进一步阐述证明了这一局限性:“如果殖民指的是所有西方殖民主义所共有的基本逻辑,是现代性的阴暗面,去殖民性是对这种基本逻辑的分析,而不是对殖民化的历史、社会和经济的分析。”^⑨笔者的看法是,如果去殖民性是对殖民主义和殖民化基本逻辑的分析,我们岂能够避而不谈对殖民化历史、社会、经济的分析?此外,如果殖民性的重点是殖民主义的基本逻辑,那么,声称去殖民性概念直到冷战结束才出现的说法似乎难以自圆其说,因为殖民主义的共同逻辑出现在殖民主义扩张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之初,前殖民地的存在比二战结束要早得多。

米格诺罗的“去殖民性”概念似乎没有充分注意最初导致殖民主义和殖民性的因素,这一点在书中第二部分的论证中得到了证明:“知识和存在的殖民性是去殖民性工作的目标:去殖民性知识将恢复殖民性知识和现代性叙事所否定和贬谪的过去和传统,它也将不受限制地打开想象,避免破坏以现代性(进步、救赎、自由等)名义标榜的、实质是殖民性的最新技术进步。”^⑩因此,这样的去殖民性概念更关注认

知和知识的去殖民化,而不是殖民存在的物质方式。西方本体论、认识论和知识生产的去殖民化当然是去殖民性的一项重要任务,如果不充分重视导致殖民化和殖民性产生的原初动因和手段,即使用船坚炮利的硬实力掠夺第三世界的土地、资源和市场以获取利润,补之以标榜文明和现代性的软实力奴役被殖民的人民以维持殖民统治,就很可能把去殖民性计划变成一种理想主义和乌托邦式的努力。

关于“去殖民性”的定义,由于该词是一个源于殖民主义和殖民性的术语,因此有必要从词源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从词源学上来讲,我们只能部分地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去殖民性是对所有殖民主义基本逻辑的分析,因为,现有的定义并没有充分涵盖“去殖民性”的外延和内涵。在该书的讨论中,“de”的词根意义被用作“撤销(undoing)”“脱钩(delink)”等,米格诺罗在书中明确指出,“去殖民性就是脱钩”。如果我们把“基本逻辑”的意义理解为“根本原因”,那么“去殖民性”就应该被理解为“消解殖民化的根本原因”或“消除殖民主义及其殖民遗产的根本原因”。根据这种理解,“去殖民性”是一种免受政治、经济、社会、知识、精神和文化殖民性影响的人类生存状况,因而应定义为“在物质、知性、心理和精神等各个方面全面的去殖民化”。我们认同殖民性不等同于殖民主义,去殖民性也不等同于去殖民化的观点,但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殖民主义是殖民化的实践,殖民性是殖民化的后果所形成的一种物质、智力、情感和精神状态。同样,去殖民化是消除殖民统治的实践,去殖民性是去殖民化的结果。从概念和历史上讲,去殖民性应该关注由殖民主义历史塑造的现在,但该书所倡导的去殖民性计划更关注从殖民历史中解放出来的未来。这种观点虽然令人鼓舞,但是却显得有些乌托邦,不切实际。

三、“去殖民性”与后殖民研究

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去殖民性”也许就是后殖民研究的一个概念或理论,但是,在发起“去殖民性”运动的思想家和从事“去殖民性”研究的学者构想中,后殖民主义通常被归入有色人种、第三世界知识

分子或少数族群对殖民主义霸权的反抗实践,而“去殖民性”是一种“分析性”和“规划性”运动,旨在离开和超越后殖民研究,“因为后殖民批评和理论是一个在学术界范围内从事的学术性转变的项目”。^⑥如果我们对去殖民性与后殖民研究的主要差异予以简要的归纳,可以说后殖民研究主要采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路径,侧重于批判殖民主义在历史上和当下所造成的各种后果,用中国学界熟悉的说法,就是侧重于“破”;去殖民性研究对西方现代性和知识进行祛魅,提倡从第三世界原有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中发掘资源,开展不受西方文化传统限制的认识论重构和知识体系的重建,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立”。

要想对“去殖民性”研究与后殖民研究的异同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必须从历史和观念两个角度来探讨“去殖民化”与“去殖民性”的关系,因为去殖民性的概念只有在殖民扩张的大背景下对“去殖民化”和“去殖民性”进行比较和对比,才能得到清晰的界定。历史上,“去殖民性”与殖民性有关,而殖民性又与殖民主义相关,是殖民化的结果。殖民主义始于500年前的大航海和大发现,当时的帝国主义国家,率先进行殖民主义扩张的是葡萄牙,紧随其后的是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美国后来也开始把部分世界划分为他们的殖民地。自16世纪以来的大约500年里,欧美帝国主义国家不仅殖民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土地,而且在被殖民人民和殖民者心灵中留下了持久的殖民影响。二战后,前殖民地相继获得独立。至今,虽然政治上的去殖民化已经结束,但殖民影响也同时终结了吗?答案很明显是否定的。随着殖民主义与现代性齐头并进,“权力的殖民母体”催生了殖民主义的持久影响,在可预见的未来,殖民主义影响不太可能消失。在全球殖民主义的历史背景下,提出“去殖民性”概念充分反映了当下的现实状况,即世界还没有摆脱殖民性。

从历史上看,去殖民化始于二战期间和战后,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结束。就概念而言,摆脱殖民化是指前殖民地人民为解放土地和建立主权的民族国家而进行的斗争,而就常识而言,去殖民化是指

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殖民主义的基础之上改变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殖民精神是殖民思维、殖民意识和殖民态度的总体性,而这种总体性又是通过殖民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意识所维系的。拒绝和抵制殖民的斗争只能算是对殖民主义的反抗,而不是去殖民化的努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地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前殖民地都努力摆脱殖民统治,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大规模去殖民化运动,“去殖民性”只有开启“去殖民化”之后才可能产生。《论去殖民性》一书中有关“去殖民性”的论述也支持了我们的观点:“伴随着殖民主义和殖民性而来的是反抗和拒绝。去殖民性必然来源于、伴随着和反映着殖民性、殖民进程和殖民状况。”此外,该书作者还认识到,去殖民性“是一种斗争和生存形式,是一种基于认识和存在的反应和实践,尤其是被殖民和被种族化的臣民对权力的殖民母体各个方面的反应和实践”。^⑦如果一个殖民地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摆脱殖民化,因为尽管被殖民人民可以拒绝和抵抗,但只要殖民统治是完整的,殖民者就能够控制并镇压任何抵抗。

去殖民性概念基本上与后殖民主义概念所涉及的领域相重叠,但去殖民性研究很少提及后殖民主义,比如,《论去殖民性》一书虽然提及了弗朗兹·法农和爱德华·萨亚德的作品,但霍米·巴巴、斯皮瓦克以及其他后殖民理论家和学者的作品甚至都没有提到。显然,该书的去殖民性探讨对后殖民主义思想家和他们的作品没有太多兴趣。作者对后殖民理论缺乏兴趣,颇令人困惑,因而需要探究其中原因。在我们看来,这种兴趣的缺乏一方面试图超越后殖民研究的有意为之,另一方面可能与他们对去殖民性的理解以及去殖民性与去殖民化的关系有关。米格诺罗认为去殖民性有许多方面:“我计划做的事是解释(去)殖民性的某一方面的特殊含义,即它在集体成员作品中所获得的意义,由三个关键词界定:现代性/殖民性/去殖民性。”^⑧为了超越后殖民研究的局限,他转向别处寻求灵感和智力资源。在他的去殖民性概念中,米格诺罗承认受到奎加诺的知识和认知重建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拒绝在西方世界观中

建立新的思想流派,相反,试图在本地知识和生活实践中发掘知识财富,这些知识和实践在殖民时代要么被妖魔化为迷信和野蛮,要么沦落为被理性和西方文明所定义的民俗、传统或精神贫困。我们十分欣赏认知重建的想法,但在我们看来,米格诺罗倾向于把“去殖民性”等同于“认识论重构”,如他提到了“去殖民性(认识论重构)”,在措词上把这两个术语相提并论。^①正如我们从词源学和概念角度所论证的那样,这个等式并不能准确地表述去殖民性与去殖民化的根源。他认为通过拒绝左派和右派的现代思想的认识论重建,前殖民地人民能够完成去殖民性的任务,实现去殖民性。但从常识的角度来看,这至少是一种幻想或乌托邦,因为殖民主义是以西方工业化和现代性的物质力量为基础和支撑的。一方面,工业化是由科技进步推动的,而科技进步为西方帝国主义提供了硬实力;另一方面,现代性带有理性、启蒙和进步的标志,赋予了西方殖民者以软实力。如果前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不能与西方实现物质、智力和精神上的平等,完全的去殖民化将永远是一项未竟之业,去殖民性将永远遥不可及。事实上,现有的“去殖民性”研究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支持这样的看法。

四、如何实现“去殖民性”

去殖民性的论述正确地将殖民主义的基本逻辑定义为构建性的,并且将其置于西方现代性观念之中:“殖民性是现代性的构成,而不是派生。也就是说,没有殖民性就没有现代性,因此就有了现代性一去殖民性的复合表达。”^②“去殖民性”研究认为,现代性和殖民性沆瀣一气,互为表里,现代性是促进、加强并使殖民性得以持久的不可或缺的工具。事实上,殖民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刚好可以用福柯的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来解释。在福柯的观念中,权力与知识相互构成、相互影响、相互加持。同样,现代性与殖民性相互影响、相互构成、相互加持。殖民主义的扩张为现代性的出现提供了动力,创造了必要条件,而现代性由于其工业化的基础,加快了殖民的速度,其标榜的现代理性给殖民主义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合法性。因此,“没有殖民主义就没有现代性”这句

话很有道理。但要开展去殖民化,根据因果律,我们就得从相反的方向去思考,提出这样的看法:“如果不对现代性进行祛魅,就没法去除殖民性。”与殖民扩张如影随形的是现代性的神话:殖民主义给落后的原住民文化带来现代化,从而给原住民带来理性和文明。英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就曾以冠冕堂皇的现代性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辩护,他在题为“白种人的负担”的一首诗歌中,号召美国人去殖民菲律宾等太平洋岛国,给那些他称之为“半是魔鬼半是孩童”的土著带去文明、理性和进步。^③

因此,去殖民性必须反思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必须对西方现代性的神话进行祛魅,这正是众多西方思想家和学者在当下一直在做的工作,比如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德里达、拉康、福柯等都对西方宣扬理性、平等、自由和人权的做法进行反思,揭露以文明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是如何与殖民主义共谋统治、压迫非西方的人民。在西方学者中,耶鲁大学讲座教授杰弗利·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在其社会学名著《现代性的阴暗面》的主旨介绍中指出:“现代性的观点体现了启蒙主义进步和理性的崇高愿望,但是现代性的现实带来巨大的痛苦,并暴露了其仍然在激发人类走向毁灭的动机。”他因此告诫人们:“认为现代性可以消除邪恶的想法是危险的妄想”。^④在当今的西方,批判现代性的阴暗面已成为文化研究的重点之一,众多跨文化研究和后殖民研究学者以详实而系统的历史资料证明,现代性是在帝国主义侵略征服、殖民压迫和剥削、奴隶贸易、殖民掠夺的基础上产生的,并成为掩盖殖民主义罪恶的一块理论遮羞布。

米格诺罗认为“权力的殖民性”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一样重要。在这两个概念中,他认为,“无意识和剩余价值是用来面对和处理影响困扰西欧社会的问题,殖民主义是用来面对和处理西欧国家的前殖民地的共同问题”。^⑤在他的概念中,殖民主义只涉及前殖民地人民,不涉及殖民者。这一点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在我们对殖民主义的理解认识中,殖民性既与被殖民的第三世界国

家有关,也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者有关,而且,弗洛伊德的心理无意识只有在改造成“文化无意识”之后才更契合去殖民性研究,关于这一点,笔者在下文将进一步阐释。我们如何才能完成消除各大洲去殖民化残留的艰巨任务呢?既然去殖民性源于殖民性,我们首先应该了解殖民主义的普遍性和跨文化性,破除和摧毁殖民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在这方面,“去殖民性”研究提出了一个最具原创性的论点,该论点睿智地对殖民主义根深蒂固的原因给出了正确的界定。殖民主义经久不衰的根源在于它与现代性的内在联系:“从去殖民性角度来说,现代性/殖民性紧密地、错综复杂地、明确地、不加约束地交织在一起。现代性的终结将意味着殖民性的终结,因此,去殖民性将不再是一个问题,而是去殖民化的终结目标。”^⑧这种对殖民主义认识论基础的分析 and 批判与汉学主义对全球性文化无意识的认识不谋而合:殖民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就是与现代性紧密相连的殖民无意识,殖民主义的内在逻辑就是文化的殖民无意识,表现在意识层面的逻辑就是既涉及前殖民宗主国人民,又涉及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文化无意识。由此而言,去殖民性研究倡导认识论重构和知识的重建具有重大的世界性意义。

但是,对西方现代性和知识体系进行祛魅,在第三世界文化传统和生活实践中发掘资源以进行超越西方文化传统的认识论重构和知识体系重建,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其阻力不仅来自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抵抗,还来自第三世界知识阶层有意无意的抵触。在此,我们可以用中国的情况说明认识论重建和知识重建是何其困难和复杂。2018年8月13日至28日,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原本是中国40年来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知性见证和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一个良机,但会议的召开却出现了严重的不和谐声音,从中可以看出西方化在中国知性生活中的复杂情况。会议的主题是一个浅显易懂的短语:“学以成人”(Learning to be Human)。此主题公布以后,网络上反对意见一时甚嚣尘上,不少学者也对此主题不以为然。有人批评它“太中国化,太儒家化,削弱了世界哲学的广度和深

度”。还有人声称,“就学术规范而言,经典的例子应该是西方哲学,而不是其他冠以国别修饰词的哲学流派,如中国哲学”。甚至还有学者声称,只要看看“学以成人”的字样,就能知道其来自于研究中国哲学的学人,其幼稚性证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尚处于襁褓阶段。更有人信誓旦旦地批评说,这根本就不不是一个哲学话题,即使把它看作一个哲学话题,它也可能受到任意的理解和讨论,以至于偏离哲学有千里之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这些批评意见重复了一个全盘西化的观点,即严格意义上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西方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这种看法在海外中国研究中也有一定市场,比如一位华裔学者在一篇文章中认为:哲学是西方的一种文化实践,不能用来指称传统的中国思想,除非从比较或类比的视角来看。^⑨

这种观点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认识:“哲学”纯粹是欧洲在古希腊首先出现的一种思想传统,是一种西方所独有的理论范畴和学科,甚至可以说是西方的独有发明,它具有特殊的理念和范畴,以及一套抽象的理论体系,而其他传统的思想不具有西方哲学的理论概念和范畴,因而称不上“哲学”。解构西方形而上学体系的德里达甚至也持有相同观点,在2001年访问中国的时候,德里达曾说过:“谈论中国思想、中国历史、中国科学等等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显然,我对谈论在欧洲模式引入之前的中国思想和文化中的中国哲学觉得有问题……哲学在本质上不是思想,它与一种具体的历史、一种语言和古希腊的一种发明相关,它是古希腊的一种发明,其后经过拉丁语和德语等语言的翻译‘转变’而来,它是一种欧洲的东西,在西欧文化之外也许有多种具有同样品质的思想和知识,但是将其称为哲学是没有道理的。”^⑩虽然德里达并没有贬低中国思想的意思,但其思考路径与黑格尔一脉相承,黑格尔坚信,真正的哲学源自古希腊,东方的思想不过是道德教化的箴言和人生的智慧,尚没有上升到体大思精的抽象思辨和精神意识系统。无论是德里达、黑格尔,还是其他认为中国没有哲学的学者,似乎都忘记了这样的共识,哲学的核心是形而上学,在世界哲学史的长河

中,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并不落后,而且在宋代的形而上学可以说是领先于西方哲学的。在海德格尔发起重新审视西方哲学的革命中,他划时代的贡献就是认识到西方的哲学是建立在有问题的甚至是错误的形而上学之上的。德里达受海德格尔启发,其解构主义理论攻击的首要对象就是西方哲学的“在场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在其解构主义理论体系中,“在场形而上学”等同于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国内外都有学者指出,海德格尔颠覆西方形而上学、撰写《存在与时间》这一巨著的灵感来自于东方,尤其是中国的老庄禅宗思想。^④因此,说中国没有哲学是难以自圆其说的,有此观点的人,无论其目的是什么,他们的认识显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他们以西方的理念和范畴对中国思想进行评判,并带有自觉和不自觉的轻蔑态度。

北京大学哲学系杨立华教授曾说过,“总有人称‘中国没有哲学’,我跟这个声音斗争了很多年”。此次争论显然是“中国没有哲学”这一观点的又一次亮相。正如有学者反批评时指出的那样,“其实这是以一种非常僵化的哲学观在衡量这个变化着的世界中的哲学,恰恰表明了一种对于哲学思想的狭隘理解”。^⑤即使以西方对哲学的理解为准绳,这些批评也忽视了哲学的本质和根本意义。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以此定义为准,大多数中国传统思想也应该归入哲学范畴。如果说中国没有哲学或儒家思想不是哲学,那么,岂不等于说中华文明中没有爱智慧的传统?这种否定的观点与黑格尔的观点遥相呼应,后者曾轻蔑地将儒学贬为一套尚未达到哲学冥想地位的智慧箴言。为了使中国思想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困扰,前面提到的那位认为中国哲学不必使用“哲学”一词的学者制造了一个新词sinosophy以取代“中国哲学”,但是,这个由希腊语“sino”(中国)和“sophy”(知识、智慧、科学)构成的复合词仍然是围着欧美的思路在思考,其为中国哲学辩护的思路在不经意之间仍然落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我们对中国是否有哲学的案例分析不仅是要揭示西方化在中国知识界的主导地位是多么根深蒂固,更是旨在说明,去殖民性理论所倡导的在西方知识体系之外重建非西

方传统的知识和认知模式的困难程度,导致这种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学主义》所说的“文化无意识”。^⑥由于文化无意识的作用,中西方学者和思想家在思考和研究非西方文化传统的时候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左右,这是完成去殖民性的终极障碍。

五、殖民无意识:“去殖民性”的终极障碍

由于殖民主义影响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有关殖民主义的“文化无意识”是跨文化和全球性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文化无意识”是殖民主义的隐形逻辑,在后殖民研究的大背景下,它是东方主义、新旧殖民主义和各种文化帝国主义的内在逻辑,并与“权力的殖民性”互为表里。在其重新构思奎加诺的“权力的殖民性”这一概念时,米格诺罗将殖民性重新定义为“权力的殖民母体”,并做出这一论断:“权力的殖民母体”是“一个可以暴露西方文明形成和自16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内在逻辑的概念”。^⑦但是,无论是米格诺罗还是奎加诺都没有对这一逻辑的内容和形式做过探索。我们认为,这一逻辑就是从殖民主义诞生之初至今在认识论和知识生产方面发生作用的殖民无意识。时至今日,政治殖民已经走完了其扩张的道路,其效应和后果大都保留在殖民遗产和民众的思想之中,并以文化无意识的形式而存在。由于殖民主义对世界文化意识的影响,全球的文化无意识应该更为恰当地称为“殖民无意识”。在文化殖民和精神殖民方面,“殖民无意识”就是新老殖民主义的隐形逻辑,也是实现去殖民性的终极障碍。

“殖民无意识”与汉学主义所构建的“文化无意识”相类似,在汉学主义概念中,“文化无意识”是指东方人和西方人在精神上共同拥有的完全不同、又相互关联的知识综合体。对于被殖民的人来说,文化无意识与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无意识概念相似,其内容主要是被压抑的创伤记忆和痛苦、焦虑和冲突的经历,或者是沮丧和自卑的感觉。因此,他们的文化无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自卑情结,这种自卑情结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表现,最终演变成所谓的“崇洋媚外心理”。对

西方人来说,它指的是一种知性无意识,具有胜利、主宰和征服的记忆和优越感。因此,他们的文化无意识具有一种隐蔽的优越情结。由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有着相同的殖民历史经历,文化无意识如同拥有正反两面的硬币,一面是殖民者的无意识,一面是被殖民者的无意识,这一两面性决定了文化意识的去殖民性必须是双向的。^③

有人可能会问:像一些至多只能算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历史上从来没有被西方殖民主义征服和统治,其文化无意识难道也带有殖民主义的无意识性质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实际上,我们只要稍微留心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学术研究和社会生活,就不难发觉,受殖民无意识影响的文化意识几乎到处都可以寻觅到其踪迹。以现代性为例,受西方思想家对现代性批判的影响,一些中国学者也开始自觉反思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但从事这样的反思不仅人数寥寥,涉及的范围不广,而且还会受到一些深受殖民无意识影响而不自知的学者的强烈批评。如有位学者曾把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斥之为“苦大仇深的民族义愤”,把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的质疑说成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对西方文化根本性的诋毁与攻击”：“出于中西二元对立的民族主义立场,中国后殖民批评……攻击的矛头不仅指向西方文化,还指向了清末和五四以来的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④如果我们对照西方后殖民学者几乎将现代性与殖民性等而视之的做法,他们对现代性与殖民主义共谋的强烈批判反衬出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的殖民无意识是何等深厚。

六、结语:走向开放的“去殖民性”研究

由拉美思想家和学者提出的去殖民性理论代表了后殖民研究的一种新趋势,整体而言,该理论旨在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在经历了500年的殖民主义和西方在生活各个方面的统治之后,如何才能实现去殖民化?在我们看来,研究去殖民性的学者从事了一项既破又立的双重任务。在“破”的层面,他们寻找殖民主义成功的原因,对西方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进行祛魅,提出“权力的殖民母体”这一概念,揭示了现代性的阴暗面和西方文明自我合法化的内在机制。他

们对现代性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进行了深入考察,打破了西方知识生产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神话。在“立”的层面,通过定位殖民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密切关系,找出了去殖民性难以实现的原因:“如果殖民性是由现代性产生的,就不存在不具殖民性的现代性,也不存在不具现代性的殖民性。要终结殖民主义,就必须终结虚构的现代性。”^⑤这是一个几乎振聋发聩的观点,与国内学者对西方现代性的讴歌和顶礼膜拜显然大相径庭,很值得我们进一步去考察。在找出殖民主义难以消失的原因基础上,该理论自觉避开在西方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后殖民研究理论,放弃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批判路径,转而号召前殖民地人民从各自的文化传统和生活实践中开发资源,进行认知反思和知识体系的重构。这些探索和讨论产生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去殖民性”思想和见解,并将为进一步探讨这一主题提供启示。

但是,该理论由于产生于拉美地区,虽然已经涉及北美、拉美、东欧、澳洲、南亚地区,但仍然有一定的地域局限,特别是其有意回避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范式和实践,试图避开左、右两方面的文化理论之争,过于乐观地相信殖民主义已经成为历史,而去殖民性则是一项未竟的智力工程,显然低估了殖民主义遗产和新殖民主义对人们思想和精神的影响。而且,该理论强调与西方认知范式和现代性脱钩,由此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轻视西方认知范式与现代性的力量,因而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二是表现为对西方知识采取激进排斥态度,忽视了在电讯技术统治的全球化时代认知的多元视角和知识的兼收并蓄,显示出一定的保守倾向。“去殖民性”是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工程和社会工程,去殖民性的概念还没有定论,而是一个开放的话题,需要从多个角度进一步讨论。“去殖民性”研究既是一种实践行为,也是一种理论构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参与者、践行者和推动者,在去殖民性的道路上探索,通过积极参与摆脱殖民思维、殖民言行和殖民无意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去殖民化,进而达到人类整体的去殖民性。

注释:

① See Nelson Maldonado-Torres, "Thinking through the Decolonial Turn: Post-continental Interventions in Theory, Philosophy, and Critique—An Introduction", *Transmodernity*(Fall, 2011): 1-15; Ramón Grosfoguel, "The Epistemic Decolonial Turn: Beyond political-economy paradigms", *Cultural Studies*, 21. 2-3 (2007): 211-223.

② Aníbal Quijano, "Coloniality of Power, Eurocentrism, and Latin America", *Nepantla: Views from South*, 1. 3(2000): 533-580.

③ Walter D. Mignolo, *The Darker Side of Western Modernity: Global Futures, Decolonial Option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④ George Ciccariello-Maher, *Decolonizing Dialectic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⑤ Walter D. Mignolo and Catherine E. Walsh, *On Decoloniality: Concepts, Analytics, Praxi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1-291.

⑥ See Michele Lobo, ed., "Critical Dialogues", *Postcolonial Studies*(2020), Vol. 23, Iss. 1.

⑦ Walter D. Mignolo and Catherine E. Walsh, *On Decoloniality*, p. 107.

⑧ Ming Dong Gu, *Sinologism: An Alternative to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 269.

⑨ Walter D. Mignolo and Catherine E. Walsh, *On Decoloniality*, p. 225.

⑩ Walter D. Mignolo and Catherine E. Walsh, *On Decoloniality*, p. 5.

⑪ Walter D. Mignolo and Catherine E. Walsh, *On Decoloniality*, p. 120.

⑫ Walter D. Mignolo and Catherine E. Walsh, *On Decoloniality*, p. 125.

⑬ Walter D. Mignolo and Catherine E. Walsh, *On Decoloniality*, p. 249.

⑭ Walter D. Mignolo and Catherine E. Walsh, *On Decoloniality*, p. 225.

⑮ Walter D. Mignolo and Catherine E. Walsh, *On Decoloniality*, p. 230.

⑯ Walter D. Mignolo, "Delinking", *Cultural Studies*, 21. 2-3

(2007): 452.

⑰ Walter D. Mignolo and Catherine E. Walsh, *On Decoloniality*, p. 17.

⑱ Walter D. Mignolo and Catherine E. Walsh, *On Decoloniality*, p. 108.

⑲ Walter D. Mignolo and Catherine E. Walsh, *On Decoloniality*, p. 231.

⑳ Walter D. Mignolo and Catherine E. Walsh, *On Decoloniality*, p. 4.

㉑ Rudyard Kipling, "The White Man's Burden: The United States &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899", *Rudyard Kipling's Verse: Definitive Edition*,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1929.

㉒ Jeffrey Alexander, *The Dark Side of Modernity*, New York: Polity Press, 2013.

㉓ Walter D. Mignolo and Catherine E. Walsh, *On Decoloniality*, p. 10.

㉔ Walter D. Mignolo and Catherine E. Walsh, *On Decoloniality*, p. 4.

㉕ Min Ouyang, "There Is No Need for Zhongguo Zhexue to Be Philosophy", *Asian Philosophy*, 22. 3(2012): 199.

㉖ From Jing Haifeng, "From 'Philosophy' to 'Chinese Philosophy': Preliminary Thoughts in a Postcolonial Linguistic Context",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37. 1(2005): 60-61.

㉗ See Reinhart May, *Heidegger's Hidden Sources: East-Asian Influences on His Work*, translated from German by Graham Parks, Florence, KY, USA: Routledge, 1996.

㉘ 孙向晨:《世界哲学大会之于我们的意义》,《中国科学报》2018年9月3日第7版。

㉙ Ming Dong Gu, *Sinologism: An Alternative to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pp. 26-41.

㉚ Walter D. Mignolo and Catherine E. Walsh, *On Decoloniality*, p. 225.

㉛ 参见顾明栋:《论文化无意识的双向去殖民化》,《学术界》2020年第4期。

㉜ 邓伟:《从“东方主义”和“汉学主义”看跨文化研究中的“强制阐释”的出路——兼论当代中国文论和批评的困境》,《江汉学刊》2017年第11期。

㉝ Micol-Rolph Trouillot, "North Atlantic Universals: Analytical Fiction",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01, No. 4(2002): 839-858.